

# 传播与分离:语言符号学哲学流变

○聂元媛<sup>1</sup> 丁文<sup>2</sup>

(1.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英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0;2.湖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无论是印刷时代还是图文共生信息时代,对语言符号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歇。以索绪尔为首的语言符号学当之无愧是结构主义哲学的始祖,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带有深深的实用主义哲学印记,莫里斯符号学是科学经验主义的代表,艾柯文化符号学与巴赫金对话理论让符号学进入社会系统。解析语言符号、系统追寻语言符号学的哲学流变在图文共生的信息时代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语言符号学;传播;分离

中图分类号: H 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 (2015) 2-0028-03

理论与科技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科学技术的突变孕育催生了层出不穷的人文学科理论思潮。但是无论是从器物时代到电子时代的极大跨越还是在以数据为信息载体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研究对象如同语言符号一样受到如此持久的关注。

纵观语言符号的欧美传播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大分支:以索绪尔(F.Saussure)、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巴尔特(R.Barthes)为代表的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以皮尔斯(C.Peirce)、莫里斯(C.Morris)、西比奥克(T.Sebeok)为代表的一般符号学或者哲学符号学研究;最后一类是以艾柯(U.Eco)和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等以语符文化作为研究核心的学者。

一、从语言符号到文艺批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烙印

作为现代语言学及符号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始终是语言符号学研究绕不开的关键人物。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观被学界解读为二元中心论(dichotomy),Hodge和Kress(Hodge&Kress 1988:17)<sup>[1]</sup>把索氏的二元对立概念归纳为:

索绪尔首先将符号系统和非符号系统(文化、社会、政治等)分开;进而将符号系统一分为二为语言和其他系统;索绪尔侧重语言的研究,又将其分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作为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承接者,索绪尔摒弃历时,注重共时研究,将语言的结构分析分为组合和聚合,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伴随着20世纪早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30年代布拉格学派、50年代的哥本哈根语言学会、60年代巴黎学派的建立发展使得结构主义符号学体系在60年代屹立于欧美人文科学研究的潮头。显而易见的是,索绪尔式的语言符号学是最基本的理论框架。

以马泰休斯(V.Mathesius)、雅各布森(R.Jakobson)、布龙达尔(V.Bronda)为代表的布拉格语言学会在沿袭索绪尔基本概念的同时侧重语言的功能,因此也被称作结构——功能

学派。作为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反动,布拉格学派敏锐地嗅到话语传递的是连续的信息,“句子功能透视图(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便是句子成分负载话语信息的典型格局,这为哈里斯(Z.Harris)创立“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空间。

由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发起的哥本哈根语言学流派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建立的语符学(Glossematics)理论将语义抽象出来,力图通过成素和关系说明语言的内在结构,以经验主义和演绎法对语言“系统”——篇章——作“序列”切分,以实现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联姻。Glossematics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到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代表韩礼德的大力推崇。

在美国,布龙菲尔德率领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受语言研究对象及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的影响,基于语言事实——言语做客观的描写,创立了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等方法成为描写主义语言学派的经典,成为后布龙菲尔德时代法位学、伦敦学派、层次语法的鼻祖,并衍生出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影响无限。<sup>[2]</sup>

20世纪60年代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受到了巴尔特(R.Barthes)的推崇形成“结构主义诗学”从而进入文艺批评领域。法国列维·斯特劳(C.L.Levi-Strauss)将索氏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理论应用到社会文化与习俗的研究,形成“结构主义社会学”或“结构主义人类学”。<sup>[3]</sup>

作为索绪尔的追随者,巴尔特结合索氏的二元概念将符号学概括为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等几对概念之间的关系。他批评索氏研究的语言“机械而理想化”。巴尔特理解的符号学就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之上的“除语言之外的意义系统”,属于元语言,是“以第二性系统的资格承载了第一性言语行为”,后者是前者的所指。符号学研究是“功能区别性原则”,“仅涉及被分析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介融合时代世界语系缩略语渗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大众传媒的语言学阐释:传媒语言学研究”(10YJC740021)

[作者简介] 聂元媛,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英语系助教;丁文,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对象的意义”。<sup>[5]</sup>巴尔特认为“语言从来就不是纯净的”<sup>[6]</sup>，文本是现实的建构手段，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这一点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极具相似性。

巴尔特评价道，“列维·斯特劳最独创的和最丰富的见解之一，即无意识并非内容（对荣格原型论的批判）而是形式，形式即所谓象征功能。这一想法与拉康的思想类似。在拉康看来欲望本身是作为一种意指系统而被表达的，这种看法导致或将导致人们以一种新方式去报集体世界的想象界，即不是像迄今为止人们所作的那样去按其‘主题’，而是按其形式和其功能去描绘它”。<sup>[7]</sup>

拉康受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理论启发，发现语言是换喻与隐喻的结合体，前者为后者提供意指语境，是意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后者是意义产生的充要条件。不言而喻，拉康的理解及分析是结构主义式的。

列维·斯特劳斯及拉康以俄狄浦斯情结为结点将精神分析理论发展运用到人类文化领域。基于拉康的无意识理论，阿尔都塞将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界定为“一般性理论”，赞扬其具有对其他理论进行元阐释能力：“一般性理论有一种特殊效果：每当它试图阐明一种特定的局部性理论、并帮助其阐述和修饰其概念时，它必须具有对这些局部性理论概念进行修饰和分类的能力”。<sup>[8]</sup>

## 二、从语符到概符：符号哲学的三维演进

### （一）皮尔斯：符号的分类与阐释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是典型的“三分论”：“符号（sig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皮尔斯通过对康德（Kant）的“物自体”和“先验知识基础”从“对象”、“关系”、“性质”三个方面建立起普遍范畴的存在关系，符号的关系体现为“媒介”、“对象”、“解释”。符号按照呈现形式分为性质符号（qualisign）、单一符号（sinsign）和法则符号（legisign）三种，“性质符号”是事物的原始状态，“单一符号”是性质符号的语境体现，“规则符号”是属于抽象的范式。按照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符号又分“图像符号”（或相似性 icon/likeness/semblance）、标志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按照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的关系，符号又分为名词符号（rheme）、命题符号（dicent）和论证符号（argument）。对符号的阐释是皮尔斯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皮尔斯将概念的解释项也分为三个类别：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动态解释项（dynamic interpretant）和终极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nt）。“符号现象的三个层面，即符号代表物、对象、解释项，并处在三个级别。符号代表物是第一性的，对象是第二性的，解释项是第三性的。第三性属于思维的存在，它将第一性与第二性关联起来。其中，对象决定着符号代表物，符号代表物决定着解释项，而对象又通过符号代表物间接决定着解释项。”<sup>[9]</sup>皮尔斯认为，直接解释项是“把符号的产生时的具体伴随情况排除在外时，符号所有显而易见之处”。（CP5:473）动态解释项是“（符号）对意识实际产生的效果”。（CP8:343）终极解释项是“符号经过充分考虑后每个解释者注定都会得到的解释”是一种理想化模型，表现为符号解释项的社会惯例化。<sup>[10]</sup>皮尔斯的无限意指活动（unlimited semiosis）理论认为，人类认知的渐进性决定了符号解释的动态性，因此符号具有无限性：相同符号在不同

人头脑中的解释项各异，由此产生新的符号代表项，继而引发了新的解释项，循环往复。<sup>[11]</sup>

### （二）莫里斯：科学经验主义

莫里斯认为，符号学=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符号意指过程（D<sub>s</sub>）=语形维度（D<sub>syn</sub>）+语义维度（D<sub>sem</sub>）+语用维度（D<sub>p</sub>），符号的基本用途包括“信息（informative）”、“估价（valuative）”、“促动（incitive）”和“系统（systemic）”四大类。符号意指过程的三个维度都具有普遍性。符号层次上的意指方式包括识别符号（identifiers）、指谓符号（designators）、评价符号（appraisers）、规定符号（prescriptors）和形式符号（formators）。符号层次上的意指方式有指谓符号、评价符号、规定符号和形式符号。指谓方式、评价方式、规定方式和形式方式四种意指方式与“信息”、“估价”、“规定”和“系统”等四种用途构建成十六种话语类型。<sup>[12]</sup>

莫里斯从语言符号类型分析出发创建一个包括逻辑、符号分析理论、价值理论、价值判断和统一等全面而折中的方法论——科学经验主义，包括“问题的出现——解决问题假设的表述——关于假设结果的演绎——通过验证演绎出来的结果而验证假设”四个步骤，后三者分别对应于实用主义的不明推论法、逻辑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和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三种推理方法。<sup>[13]</sup>

莫里斯借用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理论框架将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奥格登和理查兹的经验主义语义学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开创了符号学跨学科研究范式，开启了现代符号学的新纪元。<sup>[14]</sup>

## 三、从语符到文化：符号学的社会演进

### （一）艾柯：符号迷宫论

艾柯是把文化当作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即洛特曼的“第二模式系统”建立他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全部文化必须作为一种符号学现象而进行研究；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作为符号学活动的内容而加以研究。”<sup>[15]</sup>相较于此前的符号二分、三分法，艾柯将符号泛化为“任何可以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代替某一事物的事物”。艾柯赞同莫里斯的“无限意指活动（unlimited semiosis）理论”并由此提出符号动态运行的“符号场”概念，表达层的系统结构属于语形系统，内容层的系统结构属于意义结构或“语义场”，符号是这两个系统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盲目是唯一的（局部的）生长方式，而思想就意味着探索征程。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迷宫类型，它代表了一种可自我调节性符号学假设的百科全书式分析模型（Q模型）”。<sup>[16]</sup>

艾柯认为，符号的真正本质在于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符号阐释过程极其复杂，必须参照包含语言、社会和历史在内的文化惯例等符号“场”，人们置身于其中如同进入古希腊米诺斯迷宫、巴洛克式近代迷宫和现代根茎迷宫三种“迷宫”。“古希腊米诺斯迷宫”属于中途进入迷宫历险，“大胆臆测的机智”就是可直接连接进出口、中心的绳线；“巴洛克式近代迷宫”中人们需要在到处都是岔路、死路的迷路、失败绝境中不断重新选择才能找到出口；置身于“现代根茎式迷宫”是死路一条，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试推法”是解释符号在符号意义生成过程中的运行方式，“是对一套意指规则系统进行试探和冒险追踪，此系统使符号获得意义”。<sup>[17]</sup>

符号迷宫论形成了艾柯符号学的“符号空位理论”:符号意义的阐述如同阅读填空,符号是有待于人们推测、预设加以填充的空位。同一个人对同一符号的不同填充形成独特的阅读方式,符号不存在既定的意义。符号阐释的前提和本质就在于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与阐释的歧义性。可以说,在继承莫里斯的“无限意指活动(unlimited semiosis)理论”的基础上,艾柯的“符号空位理论”与格式塔图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 (二) 巴赫金:对话中的复调与狂欢

巴赫金认为,符号是物质的化身,“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的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符号现象都有某种物质形式:声音、物理材料、颜色、身体运动等等”。<sup>[6]</sup>因此,符号具有物质性、社会性、意识性、重音性,符号是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音符号。符号的元语言性和话语性决定了它可以承担任何意识形态功能,符号伴随和评论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因此符号具有可解码性。

通过对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巴赫金发现陀氏小说体现了对话理论的几个重要特征:小说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有各自的“言说”权,即“平等性”。“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sup>[6]</sup>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这是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命运、形象性格以及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存在的基础,亦即“自主性”。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还极具“复调”色彩:“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个人意志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sup>[7]</sup>“作者意识所反映和再现的不是客体的世界,而恰好是这些他人意识以及它们的世界,而且再现它们是要写出它们真正的不可完成的状态”。<sup>[9]</sup>

平等性形成了文学狂欢化的基础。“在隐喻意义上,狂欢化实际隐含着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同话语在权威话语消解之际的平等对话”。<sup>[20]</sup>狂欢使对等级社会禁锢的活跃,具有文化的开放性,不同内容和形式、不同的思维和表现手法展现出纷繁万状的生活现实和多元的世界价值观。文学狂欢化对社会转型期文化特征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它突破了传统文学批判欣赏的禁锢,模糊淡化了主流文化、亚文化、俗文化的界限,彼此在对立碰撞中交流对话乃至渗透吸收多元共生,彰显了文化的多元性。“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中,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sup>[21]</sup>

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带来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受其影响,洛特曼提出了符号域的概念和模式化文化符号学系统理论,认为符号系统与符号系统以外的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各系统相结合的开放系统,是“语境的内外结合”。<sup>[22]</sup>

#### 四、结语

从图符时代进入语言符号时代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此后人类又相继实现了由印刷文明向电子时代的跨越。新的世纪前半叶,人类又在信息时代实现了图文共存的回归,痛并快乐着。在此期间,符号认知和先贤的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启迪。

#### 【参考文献】

- [1] Hodge, R. and G. Kress. *Social Semiotics*. [M]. Cambridge: Polity, 1988.
- [2]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3]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陈晓明黄锡光等译. *结构人类学*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 [4]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符号学原理* [M]. 黄天源译,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 [5]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 [M]. 三联书店, 1988.
- [6] Althusser, Louis. *Three Notes on the Theory of Discourses* [A]. in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 [C].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44.
- [7] 科尼利斯·瓦尔·皮尔斯 [M]. 郝长堃译. 中华书局, 2003: 95-110.
- [8] Peirce, Charle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vol. 1 ~ 6. 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1931 ~ 1935, and vol. 7 ~ 8, edited by Arthur Bur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注: CP 后数目为册数, 后面数目为段落数。这是皮尔斯英文原著研究中的惯例。
- [9] Peirce, Charles Sanders. *Semiotic and Significanc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arles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M]. Ed. C. S. Hardwic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0] P. B. R. 1947. *The semiotic of Charles Morris* [J]. *The Kenyon Review* 9 (2): 303-311.
- [11] Morris, C. W. 1935. *Semiotic and scientific empiricism* [J]. *Actes du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1).
- [12] Posner, R. 2004. *Morris, his predecessors and followers* [A]. In R. Posner et al. (eds). *Semiotics* [C].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204-2233.
- [13] 安贝托·艾柯. *符号学理论* [M]. 卢德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14] Eco, Umberto. *A theory of semiotics* [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5] Eco, Umbert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5 ~ 326.
- [16]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2卷) [M]. 钱中文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17] 蒋述卓, 李凤亮. *对话: 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 [J]. *文学评论*, 2000 (1).
- [18]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 [19] 洛特曼. *艺术文本的结构* [A]. 胡经之, 张首映译.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 (第二卷) [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